

清代移民视域下重庆会馆的空间功能变迁

黄茂覃知艺

(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成都 610207)

摘要:清代重庆会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存在,它既是移民群体凝聚乡谊的物质载体,也是地方权力网络运作的关系空间。基于社会空间理论,结合费孝通“差序格局”对中国传统社会关系的经典阐释,系统梳理清代重庆会馆空间功能的变迁及其内在逻辑。研究发现,重庆会馆经历了从“社群庇护所”向“社区治理中心”的阶段性转变,其本质是移民实践与地方社会关系相互塑造的动态过程。康乾年间“湖广填四川”背景下,外省移民脱离原乡宗族共同体,陷入关系脱嵌的困境,会馆应运而生,为移民重建地缘社群、提供精神归属与生活保障,发挥庇护功能。咸同年间,随着代际更替与商业扩张,会馆逐步拓展功能范围和治理边界,由社群内部自治走向参与地方公共事务,成为社区治理中心。移民通过制度化实践、情感策略及与官绅合作,在“专制下的自治”框架内重塑地方社会关系空间。会馆空间功能的转型,生动展现了移民如何借助祭祀、议事、展演等具身实践,与地方权力主体互动协商,完成从“他者”到“共建者”的身份转换。重庆会馆分布稠密,独创“八省”协同机制,深度介入地方治理,为理解中国传统移民社会组织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典型范例,也为当代移民社区治理在文化认同培育、经济协作机制与多元共治模式等方面提供历史镜鉴。

关键词:重庆会馆;空间功能;社会空间;清代移民;差序格局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5)06-0141-09

DOI:10.19742/j.cnki.50-1164/C.250613

会馆是清代移民社会的重要空间载体,兼具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双重属性。重庆地处长江上游之要冲,既是“湖广填四川”移民潮的核心区域,也是会馆的密集分布区,其“密度远较其他省区一般州县为高”^{[1]65},一镇中往往“九宫十八庙”并列。与京师服务于官绅士子、江南服务于工商业行帮的会馆不同^{[2]164},重庆会馆因移民人口众多且财力雄厚,地缘纽带更紧密、自治程度更深、治理参与更广。学界将其视为撬动地方互动的“轴”^{[3]65},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职能演进与地域社会的互动关系,大致可分为以下三方面:一是会馆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史玉华认为,地方政府对会馆的扶持多采取控制加利用的手段^[4]。谯珊进一步指出,重庆会馆所体现的城市自治实质上是一种“专制下的自治”^[5];二是会馆首事与其他地方精英的互动。梁勇、周兴艳认为,八省客长与地方士绅围绕地方权力展开争夺与合作,推动会馆逐渐融入地方社会^[6];三是会馆的社会整合功能。王文涛认为,会馆通过民间动员与集体行动拓展社会关系网络,强化地方认同,推动城市新空间生产^[7]。然而,现有研究多侧重组织结构与权力互动,移

收稿日期:2025-10-12

作者简介:黄茂,女,历史学博士,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抗战时期知识分子西南边疆民族调研中的中华民族观念研究”(22BMZ153);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区域文化研究中心一般项目“身体、关系与地方社会:重庆八省会馆的空间功能变迁”(QYYJC2402)。

民个体如何通过具身实践参与社会关系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如何与会馆空间功能形成动态互构,仍有待深入阐释。

20世纪以来的社会学“空间转向”,为研究会馆这一中国本土社会现象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立足中国学术语境,张一兵在列斐伏尔“社会空间”概念基础上,深刻揭示了空间作为动态“关系性存在”^[8]的本质,认为它是“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8]的场域。而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则精准阐释了中国传统乡土社会基于血缘、地缘的亲疏远近构建关系圈层的独特组织逻辑^[9],这种亲疏关系往往表现为空间上的内外区隔^[10],为理解会馆中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及其所根植的社会结构提供洞见。聚焦重庆移民会馆这一典型样本,研究发现,移民在脱离原乡宗族纽带后,正是依托会馆这一承载动态社会关系的特殊容器,通过持续的祭祀仪式、议事决策等具身实践以及制度化的组织运作,尝试以“他者”身份逐步嵌入地方社会的关系网络。因此,深入考察重庆会馆从“社群庇护所”向“社区治理中心”转型的空间功能演变过程及其内在动力机制,不仅能够生动揭示移民实践与地方社会结构之间的互构逻辑,更能为理解当代移民社会组织如何与现代城市治理体系形成良性互动共生机制,提供宝贵的理论启示与实践参照。

一、关系脱嵌:会馆应运而生

(一)关系脱嵌背景:“湖广填四川”移民潮

自晚明以来,四川地区兵连祸结,持续战乱引发大规模灾害与瘟疫频发,导致四川人口锐减,耕地大量抛荒。至康熙二十四年(1685),已出现“蜀省有可耕之田,而无耕田之民”^[11]卷2,田赋考二,4865的失衡局面。为激活地方经济,清廷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颁布《招民填川诏》,通过赋税减免、户籍编审与官吏考绩等系列措施,构建起自上而下的移民动员机制。在政策激励下,两湖、江西及广东等地民众^[12]⁵⁹大规模“托名开荒携家入蜀”^[13]卷47,楚民离蜀疏,58,致使四川人口自康熙二十四年(1685)至乾隆元年(1736)激增六倍以上^[14]¹⁶¹⁻¹⁶⁷。重庆作为核心迁入区,其移民规模尤为显著,至嘉庆十七年(1812),移民及其后裔占比高达71.6%^[15]。

然而,政策驱动的移民潮虽有效缓解了劳动力短缺,却也埋下新的社会隐患。大量移民脱离原乡宗族共同体,意味着失去了族田、义塾等宗族保障体系,加之地理隔绝,他们无法参与原乡祭祀仪式,因而陷入物质庇护与精神归属缺失的困境。这种社会关系的断裂状态,即所谓“关系脱嵌”的结构处境。

(二)关系脱嵌表现:移民入蜀的双重困境

在原乡社会,宗族通过“同居共财”的生存模式提供多维福利保障体系。作为宗族福利基石的族田制度,通过祭田祀祖、义田济贫、学田兴教的精密分工实现多功能支撑。祭田维系祖先祭祀,义田赈济贫困族人,学田则承担教育开支与科举奖励。如光绪年间福建某宗族,其学田租银除用于“膳脩膏火之费”^[16]卷7,黄太常传,390外,还用于奖励科第中榜者,所给粟米高达八十石^[17]²³³。这种以族田为基础的经济结构维系着“日有食,岁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18]⁶²⁸的宗族共同体,使个体命运与集体利益深度嵌合,形成“何须待分你我”^[19]¹⁰⁸的内聚格局。

然而,当移民“挈家远赴四川”^[20]卷19,户口考一,5027-5028,原本“以血缘关系为基点,以地缘关系为扩充”^[21]¹¹⁵的嵌入结构随即崩解。嘉庆中期,重庆府户均人口仅3.4人,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反映出“湖广填四川”背景下,移民以小家庭为单位迁徙的血缘弱化特征^[22]⁸¹。《陈氏家谱》记载,迁蜀一族的六子中仅有一人定居新都,“其余则皆他徙”^[23]²⁶²,呈现出移民在蜀地大散居、小聚居的空间格局。在土客错居,五方杂处的环境中,移民因地理隔离难以维系原有联系,既承受“六子仅一人”的族群离散,又面临

“自占垦荒”^{[24]卷5,1}政策下的资源争夺压力,更因“远隔大河”无法参与传统的“祭祀宴享”^{[21]141}而深陷身份认同危机。原乡明确的宗族身份在异乡模糊化,新的地缘身份尚未确立,精神纽带的断裂加剧移民“他者”处境。

移民所面临的物质、精神双重困境正是关系脱嵌的集中表现。制度庇护缺失与精神纽带断裂,共同形成难以支撑移民开展社会行动的“关系真空”。当宗族长老的仲裁权威消逝而替代性的秩序尚未建立,移民的能动性则以失序形式释放,造成在异乡既被诬指为“或以罪逃,或以欠粮惧比,托名开荒”,扰害地方的“奸徒匪类”^{[25]107},又陷入“人心不谐,党类悠分,生气斗讼,往往有之”^{[26]卷18,风俗,1}的客客纠纷之中。也正是此社会关系真空中,移民亟须构建新的社会关系空间,以重建制度庇护与精神归属,会馆由此应运而生。

(三)关系脱嵌回应:会馆应运而生

社会关系真空孕育着关系空间重构的潜能。移民的脱嵌状态构成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过渡性场域,它既是原有关系空间瓦解的结果,也是关系空间真空持续扩大的动因。社会关系空间本就是一个开放且动态的过程,在秩序实效与身份重建的张力中,新的空间形态开始萌芽。

尽管移民“不得其所”,陷入双重困顿,其主体性并未消解。在关系真空中,各省移民通过仪式与互助等集体实践,在社会空间内部积极探索新秩序雏形。扎根于生存需求的能动实践,最终催生出制度化回应,会馆作为替代性关系空间在重庆广泛建立。据统计,清代川东地区有会馆258所,若按现重庆市区域划分,重庆则有各省会馆约250处,其中湖广会馆分布最广,各县皆有,达113所,其后依次为江西会馆60所、广东会馆34所、福建会馆25所、陕西会馆18所,此外还有江南会馆、山西会馆、广西会馆、贵州会馆^{[27]522-524},他们共同承载着重建社会关系、提供庇护与整合社群的多重功能。

重庆会馆应运而生,不仅是对移民脱嵌困境的现实回应,也是关系空间从断裂转向再嵌入的转折。作为地缘共同体的制度化载体,会馆将散居移民重新组织为在物质庇护与情感归属上均获支撑的社群单元,并为其后续融入地方社会、参与社区治理奠定基础。

二、社群庇护:会馆内部功能重构

会馆的兴起源于移民在关系脱嵌困境中展现的能动性实践,这一实践推动移民关系“再嵌入”,也引发重构社会关系的空间革命。这场革命以“祀神、合乐、义举、公约”^{[27]29}等会馆空间功能为依托,将离散移民重新编织进地缘共同体,实现从孤立个体向独立的社群共同体的转型。

(一)祀神:重构身份认同

祀神是重构原乡精神认同的核心机制,使失去精神依靠的移民重新获得归属感。原乡宗族祠堂因地理隔离失效后,移民基于地缘纽带,自发“联络醮资,奉其原籍地方通祀之神”^{[28]卷2,方輿下团体,8},其场所“或名曰庙,或名曰宫,或名曰祠,通称会馆”^{[28],卷2,方輿下团体,8}。所祀神灵通常与原乡文化密切相关,会馆别称亦遵循“俗尚各从其乡”^{[29]卷2,礼俗,5}原则,如福建会馆奉妈祖于天后宫,契合闽籍商帮的航运生计需求;江西会馆祀许逊于万寿宫,借“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道教传说隐喻利益共享原则;湖广会馆专供大禹,延续两湖治水记忆的同时,也解决了禹王庙“远隔大河,祭祀宴享非舟楫不通”^{[21]141}的祭祀困境,为“往来不便”“聚会日少”^{[21]141}的乡亲提供仪式空间。周期性的献祭、展演与祈福仪式,使移民“于入庙达敬之际”“油然感诸心”^{[21]142},在“神灵祭祀”和“公众聚集”的双重仪式空间中强化“我群感”^{[21]141}。这种“拟宗族化”信仰,并非简单复刻原乡祭祖仪式以构建血缘关系认同,而是以乡神为符号重新定义族群身份^{[30]59},将“我们是谁”的认同焦虑转化为地缘社群共同体的精神支柱。

(二) 合乐:修复情感纽带

会馆的合乐功能主要借助宴飨与戏剧等高频互动,修复移民的社会关系空间。展演活动依托会馆专设的戏台、戏楼进行,为“无日不演剧”“一馆数台同日皆演”^{[31]16} 的盛况提供充足的场地保障。一方面,会馆合乐频率远超传统宗族聚会,据统计,一年内江西会馆聚会三百余次,湖广会馆逾两百次,福建会馆逾百次,其他会馆亦有七十余次^{[32]72};另一方面,活动持续时间也相当可观,合川县的会馆在会期演习可达半月之久,各街演秋报戏有时长达三月,且每日均设酒席^{[33]1789},极大丰富了移民的日常文化生活。

在高频聚会中,宴飨和戏剧展演以“恭桑梓而乐游观”^{[21]144} 为名,在移民内部发挥着情感黏合剂作用,既丰富其精神和日常生活,也促进其社会关系实现再嵌入。客居蜀地的移民在“一堂谈笑,皆作乡音,雍雍如也”^{[34]24} 的氛围中重温原乡记忆,让异乡与原乡同时在场,唤起他们对原乡文化的思念,并将这种感情投射于会馆空间,进而构建起以同乡关系为基点的社会关系空间。

聚会活动的经费开支亦反映了会馆的经济实力与社群凝聚力建设的重视程度。咸丰年间,湖广会馆单次宴请的开销即高达银 59 两,钱 4 万^{[3]120},在当时已属不菲。这种高投入不仅维系会馆作为情感共同体的运行,也从侧面印证其作为地缘社群凝聚平台的经济实力与制度韧性。

(三) 义举:建立全周期保障

会馆的义举功能,即通过兴办公益事业缓解移民在异地的生存焦虑,构建覆盖移民全生命周期的保障体系。各省会馆参与善堂的创立与捐资,提供助学、施药、救济失业者等日常援助以济生者之困,又为身故同乡提供临时安息与归葬之所。教育助学方面,重庆会馆多设义塾供“在渝子弟”就学,并为学子提供考试资助。如江西会馆规定“童试每考助以青蚨 2 000 文,乡试生监一体每科助朱提 20 两,会试每科助以朱提 40 两。俟人数众多,再议膏火,举办文会”^{[21]143}。若有同乡失业、落难,会馆则为其介绍工作、提供食宿、资助返乡,保证其基本生活。此外,会馆还设立义庄,为会众中病疾、客死者提供临时安息与归葬之所,再代为运回本籍安葬^{[34]24}。这种“生养死葬”的全周期庇护体制,使移民从童蒙受教、壮年立业到叶落归根皆有依靠。会馆以“襄义举”的互济机制替代宗族的庇护功能,成为移民“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的地缘归宿,促成移民“远亲不如近邻”的心理认同,既在集体保障中强化社群归属,也是体现差序格局的地缘实践。

(四) 公约:确立秩序规则

公约功能标志着会馆从情感共同体向利益共同体的转型。在移民社会中,面对错综复杂的利益冲突,会馆通过制度性规则重塑商业秩序,对内约束同乡间的恶性竞争,对外联合抗衡他省商帮的倾轧,以实现会众“广其业于朝市间”^{[34]21} 的目标。

制度环境催生规则需求,公约机制的确立与运行主要依托于两方面。其一,“湖广填四川”移民潮促使外省客商沿长江水运涌入重庆。各地商帮在水陆枢纽设立的会馆,既成为同乡领地的标志,也构成商业网络的重要场所。在商业网络中,移民客商几乎全被组织在以会馆为载体的同乡兼同业共同体中,组织程度远超其他州县零散商人。典型如重庆开帖牙行,其数量远多于其他州县,且牙行商人基本为外省移民。嘉庆十六年(1811),八省会首清查重庆领帖开行的牙行数量,数据显示,领帖牙行 109 户中,107 户为八省会馆成员,占比高达 98%,含湖广省 43 户、江西省 40 户、福建 11 户、江南 5 户、陕西 6 户、广东 2 户^{[35]253}。

其二,移民持续涌入加剧人地矛盾,激化土客矛盾。乾隆十八年(1753),川省人均耕地尚有 33.56 亩,仅 20 年后(1773)便降至 14.99 亩,到嘉庆十七年(1812)锐减为 2.27 亩,咸丰元年(1851)暴跌至

1.04亩,至同治十二年(1873)人均耕地已不足1亩^{[21]113}。在土地清算和地界划分工作滞后的制度背景下,移民“日与土著人民互相争讼”^{[27]263}成为常态,为应对潜在的土地纠纷与财产冲突,会馆通过公约制定纠纷解决机制,有效防范各类贸易侵害。

作为“贸迁有事,祀燕集之所”^[36]的商业枢纽,会馆通过“通行情、计盈亏、评价格、讲求商术、合议商务”^{[37]73}等机制,将个体交易嵌入社群网络,并依规解决内部矛盾,最终发展成为“克服土客矛盾和客客矛盾”^{[34]2}的调和场所。公约功能从根本上改变了商人以个体身份参与市场竞争的模式,使其作为社群共同体的一员开展对外活动,同时通过规则制度整合资源、协调行动,显著提升移民群体的生存能力与商业竞争能力^{[37]69}。

(五)关系空间的局限:封闭性与排他性

重庆会馆初期是彼此相对独立、具有较强封闭性与排他性的小型关系空间,似乎也“并无将自治功能延及会馆外的必要”^[5]。究其原因,首先是原乡人意识固化,土著指斥移民为“奸徒匪类”、客籍自诩“开荒功臣”,以及“原乡人意识”在移民社会“五方杂处”格局中得到强化的现象^{[30]21},导致各会馆呈现封闭性特征。其次是移民之间的距离感源于“冠婚丧祭,各依本俗”^{[38]奥地志第一,28}的习俗差异。会馆虽有效缓解移民关系脱嵌困境,却因其基于原乡意识构建的地缘认同天然带有排他性,故难以突破社群共同体的边界限制。

总体而言,在“湖广填四川”运动初期,会馆通过祀神实现精神整合、通过合乐修复情感纽带、通过义举构建生存保障、通过公约确立利益秩序,为作为“他者”的移民提供制度性庇护,推动移民社会从散沙状向兼有地缘、血缘、业缘复合性质的社群转型。尽管同乡人意识壁垒与习俗差异限制空间开放性,但“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已在社群内部启动。当土客居民在更广泛的日常生活、展演、交易空间互动增多,社群的孤立结构逐渐松动,为后续向社区治理中心转型埋下伏笔。

三、社区治理:会馆功能拓展与地方渗透

重庆会馆为移民提供了重建社会关系的平台,其嵌入地方社会的进程本质上是移民群体与城市空间持续开展协商互动的动态结果。咸同年间,重庆城内“五方杂居”,随着移民的代际更替和商业网络的扩张,初期“家自为礼,不依一律”^{[38]奥地志第一,28}的封闭状态被打破,会馆“子孙会”^{[21]29}色彩日益淡化,取而代之的是“较高层次的一致观念”,即基于互惠关系的社区认同^{[21]116}。在此过程中,移民依托会馆空间,通过制度化集体实践、情感关系建构与官绅合作,突破城市空间的排斥,从脱嵌的“他者”转变为社区秩序的共建者。同时,会馆的功能范围也从社群自治转向更广泛的社区管理,重塑地方社会的关系图谱。

(一)制度化集体实践:构建群体权威与秩序

会馆通过制度化实践重塑内部秩序,以集体规范回应城市空间中的冲突。自康熙以来,外省移民数量急剧膨胀,土客矛盾日益尖锐,甚至有土著指责会馆“凡一家有事,群凶横行,此告被诬,挟制官府”^{[25]107}。为应对外部的排斥,各省会馆推选“年高公正”或“功名加身”,且对会产有卓越贡献的首事组成联会议事机制^{[39]585},负责在外籍客商之间协调帮规的修订、解决商业纠纷,以达到“疏通商情”^{[40]312}的目的。以道光二十七年(1847)发生的烟业行规纠纷为例,八省客长针对烟铺商户与流动挑贩“沿街发售”冲突,召集各方在府庙公所进行协商,力求“理剖明晰”^{[35]377}。经核查商契,确认经营“仍照旧章”^{[35]377},并促使游商承诺“收回烟担另寻街道开铺”^{[35]377}。同时,议事机制立约警示,要求“嗣后不得紊乱行规”^{[35]377},违规者“凭众公罚”^{[35]377},维护了行业规则的统一。

八省会馆机制的有效运行,一方面将个体实践纳入统一的制度框架,使移民规范嵌入地方社会空

间;另一方面,也以“制度化、统一化、普遍化”^{[21]121}的运作逻辑,增强会馆的组织权威与议事权力。通过“订各邦之规则”^{[41]135}等制度设计,会馆既强化对成员行为的规范,又拓展移民在地方社会中的行动边界,为后续的政治参与奠定基础。

(二)情感关系建构:消解“他者性”与促进认同

会馆通过与主流群体建构情感关系以拉近主客心理距离,促成移民形成地方认同。在原住居民群体构成主流的城市空间中,移民起初被视为空间中的“他者”,难以获得信任和接纳。为降低土著的排斥心理,会馆通过祭祀展演与公益实践,试图与土著群体建立情感关系,建构去“他者”化的身份认同,进而融入社会关系空间。具体而言,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公益事务的在地推进。移民通过育婴孩、设粥厂、建善堂、浚航道、修栈桥等一系列公益实践营造在社区中的正面形象,从而实现“去他者性”。此类义举移植原乡“敦亲睦族”的传统,营造“利他”形象,从而获取土著居民的信任;其二,神灵信仰的在地整合。为抗衡外来乡神的冲击,川主信仰及川主庙在巴蜀地区大量涌现。同时,随着原住民生活对移民的逐渐渗透,多处会馆在祭祀乡神的基础上并祀“川主”,完成从“外来信仰”向“地方信仰”的土客融合。这种融合不仅缓解了土客信仰冲突,也使会馆更具包容性。移民在会馆中的信仰实践,成为建构身份认同、深度嵌入地方关系的重要纽带;其三,展演内容及空间的公共化转型。川主与乡神的信仰融合促进了四川本土戏剧与地方戏的融合,川剧见雏形,且在会馆演出剧目中的比重日益增加。早期展演空间局限在会馆的戏台、戏楼,为避免冒犯神灵,仅限会馆成员站在回廊上观看。随着业缘关系逐渐加深,以及祭祀功能日益功利化、世俗化,展演限制也逐渐放开。官僚士绅、应试举子乃至工农商贾,皆可在庭院空地或坐或站地欣赏川剧与地方剧目。会馆展演空间从“酬神”到“娱人”的功能转变,实则是移民身份认同的在地化重构,会馆空间成为沟通主客群体的文化平台^{[42]225}。

(三)官绅合作:在权力框架内寻求庇护与协商

会馆在地方权力中心的庇护下开展官绅合作。清代官府的“统治”色彩极其浓重^[5],是地方政治权力的核心。移民若想在重庆实现去“他者”化与社会嵌入,须以会馆组织的形式与政府建立关系以获得庇护^[43],其策略为在官府主导逻辑下,达成官府与八省首事的合作。

会馆的存续高度依赖官府,从兴建到鼎盛,始终服从于官方框架。建立会馆需要主持者向地方政府提出申请,备案获批后方可动工。例如,湖广会馆正是因楚籍巡抚支持才得以兴建^{[21]144}。会馆建成后,为防止地棍骚扰,还需稟请地方政府立碑保护^{[37]67}。自乾隆朝起,伴随人口膨胀,城市内部的纠纷日益增多。官府因人力有限难以悉数处理,遂将部分城市管理权限“下放”至会馆,在官方“控制”前提下,鼓励会馆扩展管理与自治功能,以弥补政府对流动人口管理的不足,加强监管,维护地方稳定。若有同乡或同行因“细事”^[5]产生纠纷,知府、知县常批示八省首事调处裁决。如光绪年间,重庆府在医疗卫生领域颁规立案,明确谕令:“倘有滋妄扰阻,不遵条规者,着凭八省三堂首士指明稟究,以儆效尤。”^[44]这种官府赋予的特殊职能,使重庆会馆较之别处,拥有更广泛的民间基础与大众参与度^{[34]26},从而更易与主流群体建立情感关系。

除作为官民中介调解民间纠纷外,八省会馆还积极参与重庆的地方事务管理,其管理范围涵盖城市经济管理,如征收“厘金”;城市治安事务管理,如保甲、团练、城防、救灾;城市公共事务管理,如消防、赈灾、筹办军务积谷^{[21]85-86},以及筹款修复码头、教堂等公共设施^{[21]145}。乾隆二十八年(1763),为修建重庆城垣,八省会馆捐钱3960两,占巴县地方筹集总数23584两的近二成^{[45]38},其功劳“昭昭在人耳目”^{[21]145},会馆在重庆社会中的空间权力进一步提升。

然而,从知县“批仰八省客长秉公清查具复”^{[27]209}的批文可见,八省客长在协调商业纷争及裁决案件的过程中,其行动并非完全自主决断,而是在官方授权的指导之下展开的“官绅合作”^[5]。这种合作

关系一方面是源于官方机构的倡导与支持,另一方面则源自绅首主动提出请求^{[21]147}。他们主动服从规范,试图摆脱对社会和政治关系的被动依附。尽管双方互为补充,但地方政府因其政治权力地位,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正如窠季良所指出:“八省团体代表之见重于当时,实官绅合作之力有以致之。”^{[21]127}八省客长虽多以捐纳等方式跻身官阶,成为会馆与官府之间联络与沟通的重要途径之一^[5],但他们的政治地位仍然不能与以“正途”获取功名的官员相提并论。在地方事务参与上,他们仅有管理权力而无政治权力^[5]。作为各会馆的代表,他们在地方权力网络中的地位反映八省会馆实质,即会馆在地方社会空间中的权力,始终是局限于官方权力框架以内的。

总之,咸同年间的重庆社会中,移民因固有的“原乡人意识”与习俗差异,受到城市空间的排斥。然八省首事作为移民的代表,以官民中介的身份与主流群体及地方权力中心展开互动与协商。在排斥与接纳的相互作用下,移民逐渐去“他者”化,并在嵌入重庆地方社会关系空间的同时,积极实践着对空间的占有。在此过程中,尽管八省会馆的城市管理权仍局限于“专制下的自治”,其影响力已超越血缘宗族意识和地缘小群体意识。通过行使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政治职能,八省会馆整合重庆地方社会,呈现出互惠互助的社区雏形^{[21]117}。

四、结语

作为承载社会关系网络的容器,空间同时也是心理需要、社会特权与精神属性的集合^{[46]47}。对于入蜀移民而言,这些需要具体体现为政治维护、市场赢利、客地相依、权益捍卫、文化交融、管理自治、风险避害、前景开拓等迫切心理诉求^{[47]1}。重庆会馆空间功能的变迁,其本质是移民通过仪式展演、商业交易、政治协商等能动实践重塑城市空间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戏台演绎乡愁亦协商权力,议事厅裁决纠纷亦构建秩序,庭院宴饮活动亦孵化认同。正是在这种动态互构中,血缘投影为地缘纽带,离散个体得以整合为社群共同体。当会馆突破封闭边界,通过八省联合机制协调政商矛盾,借助信仰融合消弭土客隔阂,并在官府控制框架内拓展自治空间时,移民便愈发趋向“血缘与地缘的合一”^{[48]85},最终完成从“他者”到社区“共建者”的身份蜕变,生动印证了“在建造城市中,人类也再塑了自己”^{[49]35}的深刻命题。

重庆会馆的历史经验表明,唯有有效回应个体需求,构建有序关系网络,方能实现移民与地方的深度共生与秩序整合。这为当下中国在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着力构建现代嵌入式移民社区共同体,提供了宝贵的历史镜鉴。其一,以空间融合培育新乡认同。通过打造多功能公共空间与组织集体仪式活动,衔接原乡记忆与新乡归属。其二,以经济协作激活社区纽带。依托地缘网络发展互助经济体,推动移民嵌入本地产业生态。其三,以制度创新赋能多元共治。地方政府应在政策框架内扩大移民议事权,提升“自组织”专业化水平。值得注意的是,会馆治理中依关系亲疏分配资源,建立共识的“差序格局”调适逻辑,至今仍以新形式作用于社区秩序构建。因此,重庆会馆的经验已超越历史范畴,成为连接传统智慧与现代治理的宝贵财富。

[参 考 文 献]

- [1] 何炳棣. 中国会馆史论[M]. 北京:中华书局,2017.
- [2] 黎晓宏,宗朋,等. 老北京述闻 京城会馆[M]. 北京:北京出版社,2021.
- [3] 梁勇. 会馆与地方权力网络:清至民国重庆八省会馆[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
- [4] 史玉华. 会馆与政府的互动关系——兼论清代巴县的八省会馆[J]. 四川档案,2007(3):34-36.
- [5] 谯珊. 专制下的自治:清代城市管理中的民间自治——以重庆八省会馆为研究中心[J]. 史林,2012(1):1-10+187.

- [6] 梁勇,周兴艳. 移民、善堂与地方权力结构——以清代巴县至善堂为例[J].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3):21-29.
- [7] 王文涛. 移民徙川民间社会整合对重庆城镇化的塑造——以清代“湖广填四川”为例[J]. 贵州民族研究, 2023(6): 199-204.
- [8] 张一兵.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社会空间生产的物与关系——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解读[J]. 学术月刊, 2025(3):5-13.
- [9] 谢立中. “团体格局”与“差序格局”:二元对立还是二元并立? [J].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2025(2):63-73+158.
- [10] 张积家. 容器隐喻、差序格局与民族心理[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8(5):214-221.
- [11] 清朝文献通考[G]//王云五. 万有文库.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6.
- [12] 王笛. 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G]//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天津城市科学研究会. 城市史研究: 第1辑. 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 1989.
- [13] 四川通志[G]//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4.
- [14] 李世平. 四川人口史[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1987.
- [15] 李禹阶,岳精柱. 历史上的重庆移民及其信仰[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4):5-10.
- [16] 蓝鼎元. 鹿洲初集[G]//沈云龙.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1辑. 新北:文海出版社, 1989.
- [17] 方炳堃. 漳州氏族源流汇编[G]. 铅印本, 1992.
- [18] 古文观止:下[G]. 袁梅,刘炎,李永祥,徐北文,译注. 济南:齐鲁书社, 2024.
- [19] 孙永生,潘安. 客家民系民居[M].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9.
- [20] 刘锦藻. 清朝文献通考[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8.
- [21] 窦季良. 同乡组织之研究[G]//李文海.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社会组织卷.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9.
- [22] 王笛. 跨出封闭的世界 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M]. 北京:中华书局, 2001.
- [23] 罗香林. 客家研究导论 外一种 客家源流考[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8.
- [24] 余慎总. 新繁县乡土志[M]. 铅印本. 1907(光绪三十三年).
- [25] 陈世松. 四川与客家世界 第七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论文集:上[C]. 成都:天地出版社, 2005.
- [26] 什邡县志[M]. 刻本. 1813(清嘉庆十八年).
- [27] 蓝勇. 西南历史文化地理[M].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 [28] 民国重修大足县志[M]. 陈习删,等纂. 郭鸿厚,修. 中国学典馆北泉分馆, 1946年铅印本.
- [29] 江安县志[M]. 泸县:牖群书局, 1923.
- [30] 王东杰. 国中的“异乡”——近代四川的文化、社会与地方认同[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 [31] 周询. 芙蓉话旧录[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
- [32] 周勇,刘景修. 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 1876—1949[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1987.
- [33] 张森楷. 民国新修合川县志:中[M]. 北京:方志出版社, 2017.
- [34] 赵逵. “湖广填四川”移民通道上的会馆研究[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2.
- [35] 四川省档案馆,四川大学历史系. 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G].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1989.
- [36] 姜晓萍. 明清商人会馆建筑的特色与文化意蕴[J]. 北方论丛, 1998(1):60-66.
- [37] 张渝. 清代中期重庆的商业规则与秩序:以巴县档案为中心的研究[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0.
- [38] 嘉庆 南充县志[M]. 四川省数字方志馆, 2011.
- [39] 陈良学. 明清大移民与川陕开发[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5.
- [40] 袁亚平. 行走天下 浙商新形态[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3.
- [41] 杨继平,程选. 晋商文化概论[M]. 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8.
- [42] 刘凤云. 明清城市空间的文化探析[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1.
- [43] 陶伟,王绍续,朱竑. 广州拾荒者的身体实践与空间建构[J]. 地理学报, 2017(12):2199-2213.
- [44] 重庆府为饬领戳记收用务遵条规认真秉公办理等情事致医学正科王德宣札+谕一件[A]. 成都:四川省档案馆, 006-06-06371-001. 1884. 04. 30.

- [45] 四川省档案馆. 清代巴县档案汇编 乾隆卷[G]. 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
- [46] 段义孚. 空间与地方 经验的视角[M]. 王志标,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 [47] 中国会馆志编纂委员会. 中国会馆志[M]. 北京:方志出版社,2002.
- [48]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22.
- [49] 段进. 城市空间发展论[M]. 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

The Spatial Function Changes of Chongqing Guild Hal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migration in the Qing Dynasty

Huang Mao Qin Zhiyi

(College of Marx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207, China)

Abstract: The guild hall was a unique form of existence in Chongqing society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It served as both a physical carrier for immigrants to maintain their sense of belonging to their hometown and a relational space for the operation of local power network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ocial space and combining with Fei Xiaotong's unique description of the "difference order patter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al relation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patial functions of Chongqing guild halls and its internal logic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Chongqing guild halls underwent a phased transformation from a refuge for immigrant communities to a center for community governance. This process was essentially a dynamic result of the mutual construction between immigrant practices and local social relation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Hubei and Hunan Filling Sichuan" policy during the Kangxi and Qianlong periods, immigrants from other provinces were separated from their original clan communities and faced the predicament of being disconnected from their social networks. Guild halls emerged as a response, providing immigrants with the function of rebuilding their geographical communities, obtaining spiritual belonging and material security. During the Xianfeng and Tongzhi periods, with generational changes and commercial expansion, guild halls gradually expanded their functional scope and governance boundaries, shifting from internal community self-governance to participation in local affairs management, thus becoming the center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Immigrants, through institutionalized practices, emotional strategies, and cooperation with local officials and gentry, reconstructed the local social relations space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autonomy under despotism".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patial functions of guild halls profoundly reflects how immigrants, through embodied practices such as worship, deliberation, and performance, interacted and negotiated with local power entities, completing their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from "outsiders" to "co-builders" of the community. With an unprecedented distribution density, a unique eight-province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and deep governance participation, guild halls not only provide a typical case for understand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immigrant social organizations but also offer historical reference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economic collaboration mechanisms, and multi-party governance models in contemporary immigrant community governance.

Keywords: Chongqing guildhalls; spatial functions; social spaces; Qing Dynasty immigrants; differential mode

[责任编辑:陈忻]